

双重网络嵌入性、学习能力与国际化速度*

——快速国际化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李杰义¹ 闫静波¹ 王重鸣²

(1.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内容提要: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已呈现出快速国际化的新特征, 这一现象难以用传统国际化理论来解释。本文将“国际化速度”纳入到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框架, 探讨了双重网络嵌入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关系。基于长三角地区 336 家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有效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国际化经营情境下的企业网络兼具本土嵌入性与海外嵌入性的双重特征, 双重网络嵌入性和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关系中都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 拓展了企业国际化、网络嵌入性和组织学习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空间, 对于企业积极稳妥地实施国际化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本土网络嵌入性 海外网络嵌入性 学习能力 国际化速度 快速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8)09—0074—18

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 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此期间,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经营呈现出快速国际化的新现象 (Deng 和 Yang, 2015)^[1]。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国际化过程, 与发达经济体的大型企业可能是有所差异的。然而, 传统国际化理论大多忽视了国际化过程中的速度变量, 且多以发达经济体企业为研究对象 (王益民等, 2017)^[2]。虽然经典国际商务理论已触及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时间维度 (Deng 和 Yang, 2015)^[1], 但仍难以诠释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及影响机理 (Achcaoucaou 等, 2014)^[3]。快速国际化特征折射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不同行为逻辑, 要求研究者关注国际化过程的时间维度与速度变量, 对快速国际化情境特征进行更深入而细致的理论解读 (Tan 和 Mathews, 2015)^[4]。为此, Autio 等 (2000)^[5] 提出了国际化速度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的概念, 并将国际化速度作为解释企业快速国际化现象的重要变量。

收稿日期: 2017-03-23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并行分布策略的中国企业组织变革与文化融合机制研究”(7123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全球战略的制造业创新型人才开发机制与行动策略模式研究”(7147217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球创新网络的多重嵌套、演化路径与制造企业动态学习机制研究”(71673190)。

作者简介: 李杰义,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领域是跨国运营管理、创新创业管理, 电子邮箱: jieyili@163.com; 闫静波,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创新创业管理, 电子邮箱: 2503157233@qq.com; 王重鸣,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领域是组织变革、全球创业与人力资源管理, 电子邮箱: zmwang@zju.edu.cn。通讯作者: 李杰义。

现有研究普遍认同了网络嵌入性和学习能力在国际化速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Gebauer 等, 2012)^[6]。有学者认为,国际化的本质就是企业不断嵌入国际网络的过程 (Vahlne 和 Johanson, 2017)^[7],学习能力是影响企业国际化速度不可或缺的因素 (Autio 等, 2000)^[5]。Autio 等 (2000)^[5] 开创了一股强劲的国际速度研究潮流,认为早期国际化的公司比那些首次国际化晚一些的企业可能更具有“先行者”的学习优势 (Learning Advantage of Newness)。Mathews (2006)^[8] 则提出了 LLL (Linkage-Leverage-Learning, 互联 - 杠杆 - 学习) 模型,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能通过互联 (Linkage) 获取外部资源,并能在互联与杠杆 (Leverage) 的不断重复中提升学习 (Learning) 能力,有助于加快其国际化速度。

然而,相关研究成果仍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局限于把国际化速度理解为初始国际化速度 (Prashantham 和 Young, 2011)^[9],对后续国际化速度缺乏应有的关注 (Casillas 和 Acedo, 2013)^[10]。实际上,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包括初始国际化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的全过程,仅用初始国际化速度来代表国际化速度具有局限性。第二,偏重于分别考察本土或海外的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效应,而集成双重网络嵌入性视角的整合研究相对缺乏 (Achcaoucaou 等, 2014^[3];何会涛和袁勇志, 2018^[11])。由于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国际化经营情境的网络嵌入性特征有待进一步分析。第三,较多地关注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直接效应,忽视了可能中介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其他变量 (喻红阳, 2014)^[12]。学习能力有助于企业进行国际化拓展,学习能力可能是解释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影响机理的有效视角。

基于现实和理论研究的紧迫性,本文从国际化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出发,将国际化速度变量纳入到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框架,构建双重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速度的理论模型。重点聚焦于三个具体问题:(1)企业快速国际化情境下的双重网络嵌入性展示出何种特征?(2)双重网络嵌入性如何影响国际化速度?(3)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 336 家外向型制造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双重网络嵌入性 - 学习能力 - 国际化速度”的影响路径,分析了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回应了企业渐进式国际化模式与快速国际化模式争论,深化了人们对于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内在影响机制的理解,而且可以为快速国际化情境下中国企业实施积极稳妥的国际化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实证素材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 国际化速度研究的兴起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新兴经济体企业经营呈现出快速国际化的新现象 (Deng 和 Yang, 2015)^[1]。这一现象对传统国际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Naudé 和 Rossouw, 2010)^[13]。传统的乌普萨拉国际化过程模型 (Uppsala Model) 认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Johanson 和 Vahlne, 2009)^[14]。实际上,企业国际化行为是在一个动态、历时过程中发生并展开的时间序列,而国际化速度综合考虑了国际化的时间、程度与深度的变化等国际化过程维度,有助于诠释国际化战略行为的时空发展特征 (Prashantham 和 Young, 2011)^[9]。Vermeulen 和 Barkema (2002)^[15] 认为,国际化速度对正在国际化企业构成了冲击,也就是所谓的“时间压缩不经济” (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 问题。鉴于传统国际化理论难以解释国际化多重情境与国际化时空特征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由此国际化速度的研究议题得以提出与关注。

国际化速度研究源于国际商务及国际创业等理论的交叉研究 (Simsek 等, 2003)^[16]。学者起

初并未对国际化速度这一个重要概念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清晰的界定。Autio 等(2000)^[5]认为,企业如果能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海外市场,则可获得丰富的资源回馈和先动优势,因而国际化速度是影响企业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国际化速度是在一段时间内企业海外运营涉入程度的增减变化(Chetty 等,2014)^[17],可分为初始进入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Prashantham 和 Young,2011)^[9],而后续国际化速度又包括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Oviatt 和 Mcdougall,2005)^[18]。

综观现有文献,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渐进式国际化理论研究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框架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时间维度和速度变量也极少关注。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快速国际化情境,将国际化速度纳入到国际化过程研究框架之中(Hilmersson 等,2016)^[19],考虑网络嵌入性的双重特征,并在分析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关系的基础上,考察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2. 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国际商务领域学者也开始研究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机制,认为企业会加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企业网络,以更有效地取得知识资源(Williamson,1978)^[20]。Andersson 和 Forsgren(1996)^[21]最早提出了“双重网络嵌入性”(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的概念。本文综合国际商务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认为国际化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兼具双重维度,国际化企业既嵌入在其与国内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构成的本土网络之中,又嵌入在其与海外公司、东道国政府、海外科研机构、海外金融机构及海外中介组织等构成的海外网络之中。企业嵌入本土及海外网络二者交织而成的绵密的网络,有助于降低其交易的风险,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Gulati,1999)^[22]。

企业拥有的网络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其他企业不易模仿和难以替代的重要资源(Gulati,1999)^[22],因此,企业快速国际化的前提之一是网络联结与社会资本的建构(Vahlne 和 Johanson,2017)^[7]。依据战略联结理论(Strategic Linkage Theory),企业能通过国际化扩张和寻求海外合作伙伴的支持,获取进入海外市场所需的战略性资源(Harris 和 Wheeler,2005)^[23]。企业通过嵌入网络能获得潜在的初始优势,也为其进一步提高后续国际化速度提供机会(Kiss 和 Danis,2008)^[24]。尤其是在快速国际化情境下,企业会面对更多和更复杂的海外市场风险,要求企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王益民等,2017)^[2]。由于风险承担能力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性(Gulati,1999)^[22],国际化企业更需要借助网络联结与社会资本的建构(Vahlne 和 Johanson,2017)^[7],以弥补其在海外市场的“外来者劣势”(Andersson 和 Forsgren,1996)^[2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1a}:本土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正向影响。

H_{1b}: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正向影响。

H_{1c}:与本土网络嵌入性相比,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3. 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学习能力的影

学习能力在国际化速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Gebauer 等,2012)^[6],是企业通过构建组织和规范程序,获取、转化与整合知识的能力(窦红宾和王正斌,2011)^[25]。Grant(1996)^[26]明确指出,通过内外部知识的流通整合机制对既有的知识或新的知识予以重组,会形成一种新的组织知识或能力。海外合作伙伴借助其嵌入东道国网络的特性,更有机会接触到新的知识、想法和机会。网络嵌入性也将使有紧密连结的网络伙伴更懂得如何相互调适,更愿意和更容易进行专有知识和内隐知识的交换与分享。因此,学习能力可能是解释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影响机理的有效视角。缺乏必要学习能力的企业,其国际化的风险会大大增强(Gebauer 等,2012)^[6]。Autio 等(2000)^[5]开创了一股强劲的国际

可能更具有“先行者”的学习优势。企业可以通过海外知识和原有知识的整合与延伸,克服快速国际化所面临的复杂多样性的跨国环境可能带来的潜在经营风险(许晖等,2014)^[27]。

学习能力包括探索性学习能力与利用性学习能力(彭伟等,2017)^[28],其中,探索性学习能力是企业对外部知识进行获取以及对既有知识复制的能力,侧重于在新领域去寻找新知识(Li等,2017)^[29];利用性学习能力则是对企业内外部知识的重新配置和杠杆运用知识的能力,侧重于在已知的领域去精炼知识(Gebauer等,2012)^[6]。正如Luo(2002)^[30]所指出的,国际化企业的能力建构是其海外扩展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海外市场知识的取得、国际化经营知识的运用以及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发展与建构。具体而言,网络嵌入性为国际化企业发现海外市场新的商机及接触隐性知识提供了关键信息和连带(Stuart和Sorenson,2003)^[31]。企业在与其他组织的互动中,如果能建构并维持质量兼具的组织间关系连带,并予以有效的杠杆运用,则可以取得信息利益、知识交流与分享以及顺畅的资源交换(McDougall和Oviatt,2000)^[32]。海外网络嵌入性有利于提高企业对国际机会的探索性学习能力(Mohrman等,2003^[33];Ibeh和Kasem,2011^[34];Li等,2017^[35])。而且,企业与本土网络及海外网络成员之间长久的互动与合作,有助于提高企业吸收与转化知识的利用性学习能力(Jian等,2014)^[3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a}:本土网络嵌入性对探索性学习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_{2b}:本土网络嵌入性对利用性学习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_{2c}:海外网络嵌入性对探索性学习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_{2d}: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利用性学习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受历史、文化和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企业与新兴经济体企业之间存在知识势差。探索性学习作为一种前瞻性的学习策略,有助于弥补这种知识势差(吴航和陈劲,2016)^[37]。后发企业在互联与杠杆的不断重复中,能提升其探索性学习能力(Mathews,2006)^[38]。Luo和Tung(2007)^[39]也认为,海外网络是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跳板,后发企业的探索性学习过程需要海外网络提供知识支持。通过嵌入海外网络,企业能获得更加多样的海外知识和发现新的海外市场机会(Li等,2017)^[29]。因此,相对本土网络而言,企业从海外网络搜索和获取到的大多是新颖的先进知识,更有助于突变式的探索性学习。

本土网络中的企业之间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更近的地理距离,更能激发网络成员进行知识的重组、交叉、融合和优化(Funk,2014)^[40]。与海外网络嵌入性相比,本土网络资源与企业现有能力匹配程度更高,更能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Wu等,2014)^[41],减少对原有冗余知识的浪费,进而实现对网络资源的吸收和利用(Funk,2014)^[40]。虽然海外网络为企业搜寻差异化和互补知识提供了机会,但并非所有海外网络知识都被利用(吴航和陈劲,2016)^[37]。由于地理和文化差异,从海外网络获取的部分知识有可能与企业学习需求存在差距,会使利用性学习的方向不够聚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e}:与本土网络嵌入性相比,海外网络嵌入性对探索性学习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H_{2f}:与海外网络嵌入性相比,本土网络嵌入性对利用性学习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4. 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学习能力的重要性早已被许多国际商务领域学者所认同(Greg和Neimeyer,1988^[42];Zahra等,2000^[43])。企业在国际市场知识不足的情况下,通常不会选择贸然地进入国外市场,待其所需知识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才会稳步进入海外市场(Eriksson等,2015)^[44]。海外合作伙伴能由海外当地取得母公司所缺乏的战略性资产,将使企业经由国际化活动而增加其资源并强化其国际竞争力。作为国际化经营后发者,中国企业大多缺少所有权优势,缺乏国际市场知识是国际扩张的障碍(Oviatt和McDougall,2005)^[18]。学者认为,国际知识学习有助于克服企业快速国际化可能带来的

外来者与规模方面的“双重劣势”(Andersson 和 Forsgren, 1996^[21]; Prashantham 和 Floyd, 2012^[45])。国际企业的学习能力或知识吸收能力可以直接影响其国际化进程(马鸿佳等, 2015^[46]; 吴先明, 2017^[47]), 海外市场知识的取得、国际化经营知识的运用以及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发展与建构, 是一个不断加深与拓展的过程(Casillas 和 Moreno, 2014)^[48]。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可通过内部知识流通机制与外部新知识整合, 形成一种新的组织知识或学习能力(沈灏, 2017)^[49]。因此, 海外网络嵌入性可视为是一种有助于加快国际化速度的支持性机制(Nijkamp, 2003)^[50], 能使企业有更多学习和多元能力的机会(Kogut 和 Zander, 1997)^[51]。当海外合作伙伴与东道国网络之间的网络嵌入性较高时, 彼此在资源上更具异质性, 更能产生出互补性资产的效果, 这比起同质性资源的加总而言, 能发挥更大的综合绩效。因此, 企业国际化发展不仅需要新知识的探索, 也需要原有知识的不断利用和改进。虽然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的国际化会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和劣势, 但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 其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企业也有可能拥有更多的学习优势(Naisbitt, 1995)^[52]。学者们进一步认为, 学习能力对初始国际化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均具有积极的影响(Coeurderoy 和 Murray, 2008)^[53], 国际化企业只有提升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能力, 才能将海外商机转换为企业独特的国际化发展优势(周劲波等, 2014)^[54]。

作为跨国经营的后来者, 获取市场和资源是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的主要动因(熊会兵和邓新明, 2010)^[55]。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相对缺乏, 其“外来者劣势”迫使其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识别海外环境和搜索海外信息(王益民等, 2017)^[2]。传统国际商务理论强调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利用现有优势, 而针对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理论则强调国际化过程对搜索国际知识和互补资源的重要性(吴航和陈劲, 2016)^[37]。换言之, 传统国际商务理论以利用性学习为导向, 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化理论则以探索性学习为导向。探索性学习带来的海外新知识, 更有助于克服利用性学习可能带来的“能力陷阱”和“过时淘汰风险”(吴航和陈劲, 2016)^[37]。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3a}: 探索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正向影响。

H_{3b}: 利用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正向影响。

H_{3c}: 与利用性学习能力相比, 探索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5. 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

早期的研究关注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直接关系, 而忽略了可能中介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的其他因素(喻红阳, 2014)^[12]。实际上, 企业网络本身可被视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Gulati, 1999)^[22]。Sapienza 等(2006)^[56]的“认知性”学习优势理论认为, 年轻的企业相较于老企业更具认知性学习优势, 使得年轻企业的学习更为快速, 且能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国际市场。具有宽阔国际化视野与积极国际化态度的企业, 能产生学习经验曲线, 使得国际化速度大幅度地提升。蒲明和毕克新(2017)^[57]也验证了知识获取、信息传播、信息解释和组织记忆, 分别在内部嵌入性与子公司能力水平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企业运用关系资本在东道国建立当地连结, 这些连结成为由东道国获得策略性知识资源的重要基础(Chen 和 Paulraj, 2004)^[58]。企业通过学习获取必需的国际市场知识, 能让企业更快地摆脱“外来者劣势”, 实现快速的国际化扩张。

Tallman 和 Fladmoe(2002)^[59]认为, 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的多少, 以及懂得如何有效应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在快速国际化的过程中, 企业不断地尝试学习国际市场知识, 对其国际运营策略的方式会有更缜密周全的考虑, 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化速度。尤其是, 当前中国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实施基于学习能力的快速国际化战略是撬动其从追赶向超

越转变的重要杠杆(许晖等,2014)^[27]。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有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大型企业的渐进式国际化的过程及机理,而传统国际化理论大多以发达经济体企业为研究对象,因而对于中国后发企业的快速国际化现象的解释力存在不足。除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之外,中国企业更须依赖与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通过双重网络联结以扩大其自身的学习能力。为此,Mathews(2006)^[8]基于网络嵌入性理论提出了LLL模型,认为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能通过互联获取外部资源,并能在互联与杠杆的不断重复中提升探索性和利用性学习能力,有助于加快其国际化速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4a}:学习能力在本土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_{4b}:学习能力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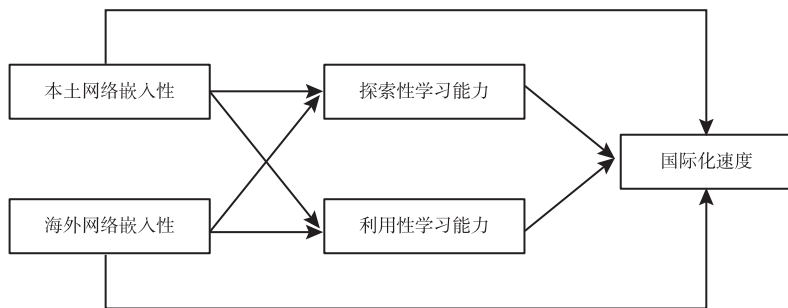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研究方法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中国在2000年提出“走出去”战略,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又在2017年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新设想,凸显了中国推进本土企业顺应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政策导向。而就全国而言,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开展较早,其国际化活动尤为活跃,并具有鲜明的快速国际化特征(许晖等,2015)^[60]。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抽样范围确定为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调研对象为外向型制造业企业,相关问卷均由从事海外业务三年以上的中高层管理者填写。调研名单来源于上述省市政府的相关外贸主管部门,本研究从中选择400家外向型制造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研问卷400份,回收调研问卷365份,得到有效问卷33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

有效问卷受试者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年龄主要集中在21~40岁,其中21~30岁的占28.57%,31~40岁的占54.17%;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占60.42%,硕士的占30.01%。有效样本企业中,从企业成立至首次海外扩张的间隔时间来看,8.04%的企业为3~5年,11.31%的企业为6~10年,33.93%的企业为11~15年,26.19%的企业为16~20年,20.53%的企业为21年以上;从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间隔时间来看,14.88%的企业为3~5年,32.44%的企业为6~10年,23.51%的企业为11~15年,18.16%的企业为16~20年,11.01%的企业为21年以上;从企业员工人数来看,500人以下的占11.01%,501~1000人占40.47%,1001~2000人占28.87%,2001~3000人占10.42%,3000人以上占9.23%,说明样本企业规模分布相对均衡;从企业国际化业务模式来看,处于出口经营、设立海外子公司、多国经营和跨国经营模式的企业分别占5.95%、37.80%、39.29%和16.96%。本研究有效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 1 样本描述

特征	特征分布	数量	比率/%
企业年龄	6 ~ 10 年	10	2.98
	11 ~ 15 年	32	9.52
	16 ~ 20 年	59	17.56
	> 20 年	235	69.94
企业规模	500 人以下	37	11.01
	501 ~ 1000 人	136	40.47
	1001 ~ 2000 人	97	28.87
	2001 ~ 3000 人	35	10.42
	3000 人以上	31	9.23
行业类型	高新技术产业	176	52.38
	一般产业	160	47.62
国际化业务模式	出口经营	20	5.95
	设立海外子公司	127	37.80
	多国经营	132	39.29
	跨国经营	57	16.96
企业成立年份与首次海外 扩张年份之差	3 ~ 5 年	27	8.04
	6 ~ 10 年	38	11.31
	11 ~ 15 年	114	33.93
	16 ~ 20 年	88	26.19
	> 20 年	69	20.53
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 年份之差	3 ~ 5 年	50	14.88
	6 ~ 10 年	109	32.44
	11 ~ 15 年	79	23.51
	16 ~ 20 年	61	18.16
	> 20 年	37	11.01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2.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参照 Prashantham 和 Young (2011)^[9]、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18]、喻红阳 (2014)^[12] 的研究, 将国际化速度分为初始国际化速度 (Initial Entry Speed, IES)、国家范围速度 (Country Scope Speed, CSS) 和国际承诺速度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Speed, ICS)。首先, 参考 Autio 等 (2000)^[5]、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18] 的研究, 以“企业成立年份与首次海外扩张年份之差”来测量初始国际化速度。其次, 参考 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18]、Casillas 和 Acedo (2013)^[10] 的研究, 国家范围速度以制度距离除以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年份之差来测量。再次, 参考黄胜等 (2017)^[61] 的研究, 以国际业务发展阶段除以自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年份之差来测量国际承诺速度。其中, “企业成立年份与首次海外扩张年份之差”和“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年份

之差”两个题项的取值范围均为1~5,取值1表示3~5年,取值5表示21年以上;制度距离采用李克特5级制量表,测量条目包括:①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与我国相比稳定且可预测;②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和我国在文化和政治体系等方面比较相似;③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政府放宽了对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优惠政策;④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金融信贷体制比较完善。进一步,将国际化业务模式分为出口经营、设立海外子公司、多国经营和跨国经营四个模式(Prashantham和Young,2011)^[9],取值1表示企业处于出口经营模式,取值4表示企业处于跨国经营模式。

(2)自变量。参照Andersson和Forsgren(1996)^[21]以及Li等(2017)^[29]的研究成果,将双重网络嵌入性分为本土网络嵌入性(Domestic Network Embeddedness, DNE)和海外网络嵌入性(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ONE),均采用李克特5级制量表,共设计八个题项。其中,本土网络嵌入性的测量条目包括:①企业与国内合作伙伴相互认可和信任;②企业与国内合作伙伴能有效地沟通;③企业拥有的国内合作伙伴数量比较多;④企业与国内合作伙伴间的合作次数很频繁。海外网络嵌入性的测量条目包括:①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相互认可和信任;②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能有效地沟通;③企业拥有的海外合作伙伴数量比较多;④企业与海外业务合作伙伴间的合作次数很频繁。

(3)中介变量。借鉴Gebauer等(2012)^[6]和彭伟等(2017)^[28]的量表,将学习能力分为探索性学习能力(Exploratory Learning Ability, ELA)和利用性学习能力(Usability Learning Ability, ULA),共设计八个题项,也均采用李克特5级制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其中,探索性学习能力的测量条目包括:①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善于识别和获取新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②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善于从内部创造新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③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能有效地在内部共享新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④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能有效地将新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并加以应用。利用性学习能力的测量条目包括:①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善于识别企业现有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②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善于将国际化知识转化为企业知识;③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能有效地在内部共享现有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④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能有效地将现有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并加以应用。

(4)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会对本研究的其他变量产生的潜在影响(Casillas和Moreno,2014)^[48],将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用企业员工人数来表征企业规模,取值1表示企业员工人数在500人以下,取值5表示企业员工人数在3000人以上;行业类型采用虚拟变量测量,是高新技术企业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考虑到国际化速度的测量已涉及企业年龄和国际化业务模式相关内容,为了避免相关模型失真和估计系数偏误的情况,未将企业年龄和国际化业务模式等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CR进行信度检验,如表2所示,各潜在变量的 α 系数和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的标准值,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采取因子载荷、平均方差萃取量(AVE)来检验收敛效度,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及AVE值都超过0.7的标准值,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表3列出了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以及AVE的平方根,显示每个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也显示,整体模型拟合情况较好($\chi^2/df=2.665 < 3, RMSEA=0.070 < 0.08, CFI=0.952 > 0.9, IFI=0.952 > 0.9, NFI=0.926 > 0.9$)。

表 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	指标	因子载荷	解释方差/%	α 值	CR	AVE
本土网络嵌入性	与国内伙伴的认可信任	0.887	79.603	0.914	0.796	0.940
	与国内伙伴的有效沟通	0.891				
	国内合作伙伴的数量	0.918				
	与国内伙伴的合作频次	0.872				
海外网络嵌入性	与海外伙伴的认可信任	0.867	81.708	0.925	0.817	0.947
	与海外伙伴的有效沟通	0.911				
	海外合作伙伴数量	0.918				
	与海外伙伴的合作频次	0.919				
探索性学习能力	新知识识别与获取	0.864	78.586	0.909	0.786	0.936
	新知识内部创造	0.909				
	新知识内部共享	0.881				
	新知识整合应用	0.891				
利用性学习能力	现有知识识别	0.797	71.658	0.868	0.738	0.919
	国际化知识转化	0.870				
	现有知识内部共享	0.883				
	现有知识整合应用	0.884				
国际化速度	初始国际化速度	0.636	77.082	0.934	0.771	0.952
	东道国法规政策	0.969				
	东道国文化政治体系	0.962				
	东道国优惠政策	0.960				
	东道国金融信贷体制	0.894				
	国际承诺速度	0.796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土网络嵌入性、海外网络嵌入性、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以及国际化速度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如表 3 所示, 可见各研究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多重共线性检验的结果显示, 各个回归模型的各解释变量的 VIF 最大值为 2.209, 低于临界值 3, 可见各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上述结果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也说明可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行业类型	0.52	0.50	N/A						
2. 企业规模	2.66	1.10	-0.086	N/A					
3. 本土网络嵌入性	3.58	1.18	-0.041	0.110*	0.970				

续表 3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4. 海外网络嵌入性	3.58	1.17	0.049	0.078	0.635**	0.904			
5. 探索性学习能力	3.52	1.20	0.226**	0.084	0.479**	0.634**	0.967		
6. 利用性学习能力	3.49	1.19	-0.032	0.159**	0.485**	0.388**	0.325**	0.957	
7. 国际化速度	1.85	1.09	0.212**	0.084	0.397**	0.448**	0.482**	0.318**	0.976

注:对角线下方为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 $p < 0.05$, ** $p < 0.01$; 对角线上的加粗值为 AVE 的平方根, N/A 表示不适合分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3. 回归分析

本研究在考虑行业类型和企业规模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

(1) 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1 是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国际化速度的回归: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的回归,构建模型 2 和模型 3。结果显示,模型 2 ($\Delta R^2 = 0.157$) 对国际化速度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本土网络嵌入性 ($\beta = 0.400, p < 0.001$) 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3 ($\Delta R^2 = 0.185$) 对国际化速度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海外网络嵌入性 ($\beta = 0.433, p < 0.001$) 对国际化速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的回归,构建模型 4。结果显示,模型 4 ($\Delta R^2 = 0.211$) 对国际化速度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本土网络嵌入性 ($\beta = 0.209, p < 0.01$) 与海外网络嵌入性 ($\beta = 0.300, p < 0.001$) 也均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_{1a} 和假设 H_{1b} 均得到检验。

表 4 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变量	国际化速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行业类型	0.221***	0.234***	0.197***	0.211***
企业规模	0.103	0.060	0.067	0.056
本土网络嵌入性		0.400***		0.209**
海外网络嵌入性			0.433***	0.300***
R^2	0.056	0.213	0.241	0.267
Adj- R^2	0.050	0.206	0.234	0.258
ΔR^2		0.157***	0.185***	0.211***
F 值	9.787***	30.011***	35.150***	30.101***
DW	1.470	1.634	1.612	1.63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在此基础上,参照 Liu 等(2009)^[62]的检验方法,采用如下三种方法来分析本土网络嵌入性及海外网络嵌入性作用的强弱:首先, $\Delta R^2_{\text{模型4-模型2}}$ 是在本土网络嵌入性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嵌入性后,模型 4 解释国际化速度程度的变化 ($\Delta R^2_{\text{模型4-模型2}} = 0.054$); $\Delta R^2_{\text{模型4-模型3}}$ 是在海外网络嵌入性基础上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后,模型 4 解释国际化速度程度的变化 ($\Delta R^2_{\text{模型4-模型3}} = 0.026$)。结果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比本土网络嵌入性要强。其次,通过计算本土网络嵌入性

和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速度的半偏相关系数,发现两者半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184 和 0.261,这也表明,与本土网络嵌入性相比,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更强。再次,对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的回归系数进行 Z 检验,这又表明,相较于本土网络嵌入性,海外网络嵌入性 ($Z = 4.910 > 2.580, p < 0.01$) 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较强。假设 H_{1c} 得到检验。

(2) 学习能力与国际化速度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构建模型 6 和模型 7。结果显示,模型 6 ($\Delta R^2 = 0.191$) 对国际化速度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探索性学习能力 ($\beta = 0.451, p < 0.001$) 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7 ($\Delta R^2 = 0.097$) 对国际化速度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利用性学习能力 ($\beta = 0.317, p < 0.001$) 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构建模型 8。结果显示,模型 8 ($\Delta R^2 = 0.222$) 对国际化速度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探索性学习能力 ($\beta = 0.387, p < 0.001$) 和利用性学习能力 ($\beta = 0.191, p < 0.001$) 对国际化速度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_{3a} 和假设 H_{3b} 得到检验。

同样地,采用如下三种方法来检验假设 H_{3c} :首先, $\Delta R^2_{\text{模型8-模型6}}$ 是在探索性学习能力基础上加入利用性学习能力后,模型 8 解释国际化速度程度的变化 ($\Delta R^2_{\text{模型8-模型6}} = 0.031$); $\Delta R^2_{\text{模型8-模型7}}$ 是在利用性学习能力基础上加入探索性学习能力后,模型 8 解释国际化速度程度的变化 ($\Delta R^2_{\text{模型8-模型7}} = 0.125$)。结果表明,探索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比利用性学习能力要强。其次,计算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影响国际化速度的半偏相关系数,发现两者半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384 和 0.205,这也表明,与利用性学习能力相比,探索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更强。再次,对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的回归系数进行 Z 检验,结果显示,探索性学习能力 ($Z = 7.574 > 2.580, p < 0.01$) 对国际化速度的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强于利用性学习能力。假设 H_{3c} 得到检验。

表 5 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变量	国际化速度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行业类型	0.221 ***	0.115 *	0.227 ***	0.134 **
企业规模	0.103	0.056	0.053	0.033
探索性学习能力		0.451 ***		0.387 ***
利用性学习能力			0.317 ***	0.191 ***
R^2	0.056	0.247	0.153	0.278
Adj- R^2	0.050	0.240	0.146	0.270
ΔR^2		0.191 ***	0.097 ***	0.222 ***
F 值	9.787 ***	36.227 ***	20.042 ***	31.923 ***
DW	1.470	1.473	1.561	1.50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3) 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学习能力的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首先,模型 9 是控制变量与因变量探索性学习的回归;在模型 9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构建模型 10 和模型 11。结果显示,模型 10 ($\Delta R^2 = 0.231$) 对探索性学习能力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本土网络嵌入性 ($\beta = 0.484, p < 0.001$) 对探索性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11 ($\Delta R^2 = 0.381$) 对探

索性学习能力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海外网络嵌入性($\beta = 0.620, p < 0.001$)对探索性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 9 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构建模型 12。结果显示,模型 12($\Delta R^2 = 0.394$)对探索性学习能力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本土网络嵌入性($\beta = 0.150, p < 0.01$)和海外网络嵌入性($\beta = 0.525, p < 0.001$)对探索性学习能力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_{2a} 和假设 H_{2c} 得到检验。

承前所述,采用如下三种方法来检验假设 H_{2c} :首先, $\Delta R^2_{模型12-模型10}$ 是在本土网络嵌入性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嵌入性后,模型 12 解释探索性学习能力程度的变化($\Delta R^2_{模型12-模型10} = 0.163$); $\Delta R^2_{模型12-模型11}$ 是在海外网络嵌入性基础上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后,模型 12 解释探索性学习能力程度的变化($\Delta R^2_{模型12-模型11} = 0.013$)。结果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探索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强于本土网络嵌入性。其次,计算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探索性学习能力的半偏相关系数,发现两者半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154 和 0.481,这也表明,与本土网络嵌入性相比,海外网络嵌入性对探索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更强。再次,对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的回归系数进行 Z 检验,分析表明,与本土网络嵌入性相比,海外网络嵌入性($Z = 9.970 > 2.580, p < 0.01$)对探索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较强。假设 H_{2c} 得到检验。

其次,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模型 13 是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利用性学习的回归:在模型 13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构建模型 14 和模型 15。结果显示,模型 14($\Delta R^2 = 0.211$)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本土网络嵌入性($\beta = 0.473, p < 0.001$)对利用性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模型 15($\Delta R^2 = 0.143$)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海外网络嵌入性($\beta = 0.381, p < 0.001$)对利用性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在模型 13 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构建模型 16。结果显示,模型 16($\Delta R^2 = 0.232$)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整体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本土网络嵌入性($\beta = 0.388, p < 0.001$)和海外网络嵌入性($\beta = 0.135, p < 0.05$)对利用性学习能力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假设 H_{2b} 和假设 H_{2d} 得到检验。

进一步,采用如下三种方法来检验假设 H_{2f} 。首先, $\Delta R^2_{模型16-模型14}$ 是在本土网络嵌入性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嵌入性后,模型 16 解释利用性学习能力程度的变化($\Delta R^2_{模型16-模型14} = 0.021$); $\Delta R^2_{模型16-模型15}$ 则是在海外网络嵌入性基础上加入本土网络嵌入性后,模型 16 解释利用性学习能力程度的变化($\Delta R^2_{模型16-模型15} = 0.089$)。分析表明,与海外网络嵌入性相比,本土网络嵌入性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较强。其次,分析发现,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影 响利用性学习能力的半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326 和 0.120,显示出与海外网络嵌入性相比,本土网络嵌入性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更强。本研究还对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的回归系数进行 Z 检验,结果又显示,相较于海外网络嵌入性,本土网络嵌入性($Z = 6.282 > 2.580, p < 0.01$)对利用性学习能力的影 响较强。假设 H_{2f} 得到检验。

表 6 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学习能力的影 响

变量	探索性学习能力				利用性学习能力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行业类型	0.235 ***	0.250 ***	0.200 ***	0.210 ***	-0.019	-0.004	-0.040	-0.014
企业规模	0.104	0.052	0.052	0.044	0.158 **	0.107	0.126 *	0.105 *
本土网络嵌入性		0.484 ***		0.150 **		0.473 ***		0.388 ***
海外网络嵌入性			0.620 ***	0.525 ***			0.381 ***	0.135 *

续表 6

变量	探索性学习能力				利用性学习能力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R^2	0.062	0.293	0.443	0.456	0.026	0.247	0.169	0.258
Adj- R^2	0.056	0.287	0.438	0.450	0.020	0.240	0.162	0.249
ΔR^2		0.231 ***	0.381 ***	0.394 ***		0.211 ***	0.143 ***	0.232 ***
F 值	10.971 ***	45.866 ***	88.040 ***	69.445 ***	4.390 *	36.287 ***	22.542 ***	28.731 ***
DW	1.436	1.723	1.760	1.785	1.540	1.682	1.633	1.672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4) 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承上所述, 在模型 22 和模型 23 中, 双重网络嵌入性各维度和学习能力各维度均对国际化速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模型 18 和模型 20 中, 双重网络嵌入性各维度对学习能力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 模型 24 是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到以国际化速度为因变量的模型, 可见, 本土网络嵌入性 ($\beta = 0.127, p < 0.05$) 和海外网络嵌入性 ($\beta = 0.156, p < 0.05$) 对国际化速度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对模型 22 和模型 24 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发现, 本土网络嵌入性 β 系数由模型 22 中的 0.209 下降至模型 24 中的 0.127, 海外网络嵌入性 β 系数由模型 22 中的 0.300 下降至模型 24 中的 0.156, 表明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在学习能力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 H_{4a} 和假设 H_{4b} 得到检验。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探索性学习能力		利用性学习能力		国际化速度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行业类型	0.235 ***	0.210 ***	-0.019	-0.014	0.221 ***	0.211 ***	0.134 **	0.161 **
企业规模	0.104	0.044	0.158 **	0.105 *	0.103	0.056	0.033	0.033
本土网络嵌入性		0.150 **		0.388 ***		0.209 **		0.127 *
海外网络嵌入性		0.525 ***		0.135 *		0.300 ***		0.156 *
探索性学习能力							0.387 ***	0.245 ***
利用性学习能力							0.191 ***	0.116 *
R^2	0.062	0.456	0.026	0.258	0.056	0.267	0.278	0.312
Adj- R^2	0.056	0.450	0.020	0.249	0.050	0.258	0.270	0.300
ΔR^2		0.394 ***		0.232 ***		0.211 ***	0.222 ***	
F 值	10.971 ***	69.445 ***	4.390 *	28.731 ***	9.787 ***	30.101 ***	31.923 ***	24.891 ***
DW	1.436	1.785	1.540	1.672	1.470	1.635	1.505	1.560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4. 内生性检验

通过 Durbin-Wu-Hausman 内生性检验, 得知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学习能力具有内生性。快速国际化已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最为震撼的全新特征 (Deng 和 Yang, 2015)^[1]。在此

情境下,国际创业导向型企业会面临更多的“外来者劣势”和更复杂的海外风险,其更需重视建构本土和海外网络关系(Andersson和Forsgren,1996)^[21],因而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于国际创业导向。由此,本文参考吴航和陈劲(2016)^[37]的研究,引入国际创业导向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国际创业导向的测量参照Knight和Cavusgil等(2004)^[63]开发的国际创业导向量表,共设计了六个题项, α 值为0.861。以国际创业导向作为自变量,双重网络嵌入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创业导向对双重网络嵌入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Cragg-Donald F统计量检验值为35.12,大于16.38的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合理。

五、研究结果讨论

1. 研究结果及理论贡献

本研究整合国际化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实证检验了“双重网络嵌入性-学习能力-国际化速度”的影响路径,并分析了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得出如下具有一定理论贡献的结论。

(1)时间和速度是诠释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特征的关键维度。已有相关文献缺乏对初始国际化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的整合研究(Hilmersson等,2016)^[19],且大多以发达经济体企业为研究对象,大多数研究也忽略了国际化速度测量的质量指标,因而不足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快速国际化现象(Chetty等,2014)^[17]。与发达经济体的大型企业不同,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自身的资源较为有限,其国际化情境条件、发展过程及驱动模式具有独特性。本研究跨越了现有的“渐进-激进”两分局限性,并将企业国际化过程视作包括初始国际化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的全过程,使用国家范围速度和国际承诺速度等质量指标来测量后续国际化速度(黄胜等,2017)^[61],因而更贴近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真实情境。在此基础上,利用本土外向型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了双重网络嵌入性、学习能力与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关系,是对企业渐进式国际化模式与快速国际化模式争论的回应与澄清(Tan和Mathews,2015)^[4]。

(2)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都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有研究已证实,网络嵌入性有助于跨国公司从海外获取战略性资源,网络嵌入性类型和强度对国际化速度有显著影响(Kiss和Danis,2008)^[24]。本研究发现,本土网络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嵌入性都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双重网络嵌入性中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较强。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组织优势较弱,且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建立其本土网络连结。因此,海外合作伙伴在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知识和资源传递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表明,面对全球经济的大潮,增强本土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尤其是海外网络嵌入性,有助于其获取与利用国际化战略性资源,进而降低其规模与海外市场“双重劣势”(Andersson和Forsgren,1996)^[21],进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其国际化战略。该结论揭示了跨国情境下网络嵌入性的双重特征,延伸并拓展了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进程的相关研究(Li等,2017)^[29],深化了Harris和Wheeler(2005)^[23]以及许晖等(2014)^[27]有关国际化进程的深度案例跟踪研究。

(3)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都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已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可能中介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关系的其他变量(喻红阳,2014)^[12],也缺少探究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Li等,2017)^[29]。本研究发现,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在本土企业主动嵌入海外网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更为直接,借助获取知识和学习经营模式能更快速地抢夺国际商机。研究结果支持并拓展了Li等(2017)^[29]以及Kiss和Danis

(2008)^[24]有关“网络嵌入性→组织学习→国际化速度”影响路径的研究,为揭开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2. 管理启示

(1)快速国际化为我国企业创造“先行者优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可以弥补“时间压缩不经济”可能带来的国际化经营风险(Autio等,2000)^[5]。因此,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不宜过于激进,而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来控制国际化速度及节奏,实施积极稳妥的国际化战略布局。

(2)国际化情境下的双重网络嵌入性,为本土企业提供了潜在的学习国际经营知识的机会。因此,为克服其“规模劣势”或“外来者劣势”(Andersson和Forsgren,1996)^[21],本土企业在国际化扩张进程中,首先应致力于本土合作网络的建设,增强其与本地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本土合作伙伴的互动频率、承诺与共赢的良好关系;以此为基础,重视海外网络关系的建构,着力促进其与海外公司、东道国政府、海外科研机构、海外金融机构及海外中介组织等海外合作伙伴的相互认可与信任,从而充分地获取和利用国际化网络资源。

(3)外向型企业的知识获取与移转渠道趋向多元化,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都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本土企业应重视探索性学习能力和利用性学习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速度之间的传导作用(Casillas和Acedo,2013)^[10],通过建立起开放包容与共享合作的学习机制,并创造动态的国际学习环境,以培育出探索性学习及利用性学习能力。

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局限性,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间。首先,本研究提出了双重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速度影响机制的理论命题,并利用外向型制造企业的问卷数据对该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然而,本研究并未就海外网络嵌入性与本土网络嵌入性进行关联分析,后续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其次,本研究未就影响国际化速度的信息技术应用和跨文化距离等其他变量加以研究,对此,后续研究有待进一步厘清。最后,本研究并未对双重网络嵌入性和学习能力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后续研究可通过采用纵贯的实证设计,以深化对上述动态演化机制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Deng, P., and M. Yang.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Emerging Market Firm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 24, (1): 157 - 172.
- [2]王益民,梁枢,赵志彬. 国际化速度前沿研究述评:基于全过程视角的理论模型构建[J]. 上海: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9): 98 - 112.
- [3]Achcaoucaou, F., P. Miravittles, and F. León-darder. Knowledge Sharing and Subsidiary R&D Mandate Development: A Matter of Dual Embeddednes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 (1): 76 - 90.
- [4]Tan, H., and J. A. Mathews.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Leverage Strategizing: The Case of Chinese Wind Turbine Manufacturer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5, 50, (3): 417 - 427.
- [5]Autio, E., H. J. Sapienza, and J. G. Almeida. Effects of Age at Entry,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Imitability on International Growt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5): 909 - 924.
- [6]Gebauer, H., H. Worch, and B. Truffer. Absorptive Capacity, Learning Processes and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s Determinants of Strategic Innovation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0, (1): 57 - 73.
- [7]Vahlne, J. E., and J. Johanson.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Evolution: The Uppsala Model at 40 Yea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 48, (9): 1087 - 1102.
- [8]Mathews, J. A.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23, (2): 139 - 141.
- [9]Prashantham, S., and S. Young. Post-entry Speed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35, (2): 275 - 292.

- [10] Casillas, J. C. , and F. J. Acedo. Speed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3, 15, (1) :15 – 29.
- [11] 何会涛, 袁勇志. 海外人才创业双重网络嵌入及其交互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J]. *武汉: 管理学报*, 2018, (1) :66 – 73.
- [12] 喻红阳. 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广度、深度研究——基于商务部的数据分析 [J]. *北京: 商业经济研究*, 2014, (2) :89 – 91.
- [13] Naudé, W. , and S. Rossouw. Early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xtent and Determinants [J]. *Wider Working Paper*, 2010, 8, (1) :87 – 111.
- [14] Johanson, J. , and J. E. Vahlne.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 Revisited: From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o Liability of Outsider Ship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 (9) :1411 – 1431.
- [15] Vermeulen, F. , and H. Barkema. Pace, Rhythm and Scope: Process Dependence in Building a Profitabl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 (7) :637 – 653.
- [16] Simsek, Z. , M. H. Lubatkin, and S. W. Floyd. Inter-firm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 (3) :427 – 442.
- [17] Chetty, S. , M. Johanson, and O. M. Martin.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4, 49, (4) :633 – 650.
- [18] Oviatt, B. M. , and P. P. McDougall. Defining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ling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05, 29, (5) :537 – 553.
- [19] Hilmersson, M. , M. Johanson, and H. Lundberg, et al. Time, Temporal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int in Time, Time to, and Speed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6, 25, (1) :67 – 94.
- [20]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78, 86, (343) :619.
- [21] Andersson, U. , and M. Forsgren. Subsidiary Embeddedness and Control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996, 5, (5) :487 – 508.
- [22] Gulati, R. Network Location and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esourc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on Alliance Form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5) :397 – 420.
- [23] Harris, S. , and C. Wheeler. Entrepreneurs' Relationship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Functions, Origins and Strategie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5, 14, (2) :187 – 207.
- [24] Kiss, A. N. , and W. M. Danis. 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text,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6, (6) :388 – 399.
- [25] 窦红宾, 王正斌. 网络结构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中介作用 [J]. *天津: 南开管理评论*, 2011, (3) :15 – 25.
- [26] Grant, R. 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 (S2) :109 – 122.
- [27] 许晖, 许守任, 王睿智.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国际化转型及创新路径——基于六家外贸企业的跨案例研究 [J]. *北京: 科学学研究*, 2014, (1) :73 – 83.
- [28] 彭伟, 唐康丹, 符正平. 组织二元性视角下海归创业企业战略导向与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研究 [J]. *武汉: 管理学报*, 2017, (11) :1662 – 1671.
- [29] Li, J. Y. , J. X. Cao, and Y. Q. Liu.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J].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017, 13, (8) :5219 – 5229.
- [30] Luo, Y. Capability Exploitation and Building in a Foreign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 (1) :48 – 63.
- [31] Stuart, T. , and O. Sorenson. 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03, 28, (1) :1 – 22.
- [32] McDougall, P. P. , and B. M. Oviatt.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Research Path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5) :902 – 906.
- [33] Mohrman, S. A. , R. V. Tenkasi, and A. M. Mohrmanjr.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A Grounded Analysis [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003, (3) :301 – 323.
- [34] Ibeh, K. , and L. Kasem. The Network Perspec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Software Firms from Syria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1, 40, (3) :358 – 367.
- [35] Li, J. Y. , Y. Q. Liu, and J. X. Cao. Effects of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ship Learning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2017, 20, (6) :1581 – 1586.
- [36] Jian, Z. Q. , J. D. Chen, and X. Y. Zheng. The Impact of Network Competence and Relationship Learning on Servi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14,(3):91-99.

[37]吴航,陈劲. 国际搜索与本地搜索的抉择——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创新效应研究[J]. 天津: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9):102-113.

[38]Mathews,J. A. Dragon Multinationals: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23,(2):139-141.

[39]Luo, Y. , and R. Tu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1-18.

[40]Funk,R. J. Making the Most of Where you are:Geography,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4,57,(1):193-222.

[41]Wu, J. , andZ. Wu.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earch and Product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y Boundary Spanning[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4,23,(3):542-551.

[42]Greg,J. , and F. Z. Neimeyer. Specificity of Social-Cognitive Schema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1988,1,(2):139-150.

[43]Zahra,S. A. ,R. D. Ireland, and M. A. Hitt.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by New Venture Firms:International Diversity, Mode of Market Entry,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5):925-950.

[44]Eriksson, K. , J. Johanson, and A. Majkgård, et al.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Cos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J]. Palgrave Macmillan UK,2015,28,(2):1-25.

[45]Prashantham, S. , and S. W. Floyd. Routine Micro-processes and Capability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2,43,(6):544-562.

[46]马鸿佳,侯美玲,宋春华. 创业战略态势、国际学习与国际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 北京:科学学研究,2015,(8):1203-1214.

[47]吴先明. 企业特定优势、国际化动因与海外并购的股权选择——国有股权的调节作用[J]. 北京:经济管理,2017,(12):41-57.

[48]Casillas, J. C. , and A. M. Moreno-menéndez. Speed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e Role of Diversity and Depth in Experiential Learn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45,(1):85-101.

[49]沈灏. 转型经济环境下社会资本和组织学习对企业战略变化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比分析[J]. 北京:经济管理,2017,(6):69-85.

[50]Nijkamp, P. Entrepreneurship in a Modern Network Economy[J]. *Regional Studies*,2003,37,(4):395-405.

[51]Kogut, B. , and U. Zander. 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J]. *Knowledge in Organisations*,1997,(3):17-35.

[52]Naisbitt, J. Global Paradox: The Bigger the World Economy, the More Powerful its Smallest Players [J]. *Magill Book Reviews*,1995,37,(5):588-592.

[53]Coeurderoy, R. , and G. Murray.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and the Location Decision: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Foreign Market Entries of New Technology Based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9,(4):670-687.

[54]周劲波,黄胜,叶广宇. 组织学习、合法性与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J]. 天津: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11):129-141.

[55]熊会兵,邓新明. 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研究[J]. 北京:经济管理,2010,(7):63-69.

[56]Sapienza, H. J. , E. Autio, and G. George, et al. A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the Effects of 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Firm Survival and Growt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4):914-933.

[57]蒲明,毕克新. 内部嵌入性、学习过程与跨国子公司发展研究[J]. 北京:中国软科学,2017,(4):132-140.

[58]Chen, I. J. , and A. Paulraj. Towards a Theory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s and Measurements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04,22,(2):119-150.

[59]Tallman, S. , and L. K. Fladmoe.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apability-Based Strategy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2,45,(1):116-135.

[60]许晖,王琳,张阳. 国际新创企业创业知识溢出及知识整合机制研究[J]. 北京:管理世界,2015,(6):141-153.

[61]黄胜,叶广宇,丁振阔. 国际化速度、学习导向与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绩效[J]. 天津: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7):141-154.

[62]Liu, Y. , Y. Luo, and T. Liu. Governing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Transactional and Relational Mechanisms: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09,27,(4):294-309.

[63]Knight, G. A. and S. T. Cavusgi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Born-global Firm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4,35,(2):124-141.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Learning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 Empirical Study under Instant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text

LI Jie-yi¹, YAN Jing-bo¹, WANG Zhong-m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resents a new feature of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y has been unable to explain the intrinsic rol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Based on effective sample survey data of 336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China,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n empirically examines effects of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learning ability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analyz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Th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learning abilit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Firstly, mos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ies ignore the speed variabl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enterprises in advanced economie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regards the whole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including initial entry speed and post-entry speed, which helps impro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phenomen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econd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or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tegrated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s is relatively lack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both domestic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have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that overseas networks embeddedness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this study is an activ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existing research. Finally, existing research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rect effect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ignore other variable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both exploratory learning ability and usability learning ability play an important medi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ocal enterprises actively embedding overseas networks, and exploratory learning ability and usability learning ability have more direct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The resul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covering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hav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Firstly, the premise that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creates the “forerunner advantag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s that enterprises must have sufficient capabilities to make up for the operational risks that “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 may bring.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ans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adopt a cautious attitude to control the speed and pa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mplement an active and sou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Secondly,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first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cal cooper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is, the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network relations in order to fully access and use international network resources. Thirdly,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mission of learning ability between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should adopt an active and initiative attitude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learning mechanism and cultivate exploratory learning ability.

Key Words: domestic network embeddedness;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learning abil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instant internation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20, D83, D85

DOI: 10.19616/j.cnki.bmj.2018.09.005

(责任编辑:刘建丽)